“两个效益”视阈下 无锡王氏家族出版理念研究

屈海香

出版包括编辑、复制和发行三要素。出版的“两个效益”，指出版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文化企业提供精神产品，传播思想信息，担负文化传承使命，必须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但近年来，有些文化企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现象时有发生。正确认识和处理“两个效益”的关系，是出版工作的难点和热点。

在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深化改革的当下，回首无锡地方文史，可以发现，无锡小娄巷嘉乐堂王氏家族，其第 13 代至 15 代裔孙，出现了三位大家，分别是文学家王蕴章、科学家王选、出版家王益，恰好契合了“编辑—复制—发行”三要素划分的整个出版过程，他们都为中国的出版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以出版的“两个效益”的视角研究王蕴章、王选和王益的出版理念，对深化出版体制改革具有历史启迪与借鉴意义。

一、王蕴章：因循变革的编辑方针

王蕴章(1884-1942)，字苑农，号西神，别号窃九生、红鹅生，别署二泉亭长、鹤脑词人、西神残客等，室名菊影楼、篁冷轩、秋云平室，是无锡小娄巷嘉乐堂王氏的第 13 代裔孙。王蕴章通诗词，工书法，擅作小说，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副榜举人，后应邀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参与编刊首版《辞源》。1911 年《小说月报》创刊，王蕴章任首任主编。1925 年他游历南洋，数年后归国，曾经先后担任上海沪江大学、南方大学、暨南大学国文教授，正风文学学院院长，《新闻报》秘书、编辑、主笔等职。1942 年 8 月，王蕴章在上海病逝，终年 58 岁。评论者称他为“动荡时代的江南旧文人”“一位在新旧历史夹缝中的编辑”，其实，王蕴章也能够做到因循变革。

《小说月报》在民国初年文坛的影响巨大。王蕴章第一次任《小说月报》的主编是从 1910 年 7 月到 1911 年 12 月，编辑杂志第一卷和第二卷合计 19 期。创刊的“编辑大意”中说：“本馆旧有《绣像小说》之刊，欢迎一时，嗣响遽寂”，由此可见，商务印书馆创刊《小说月报》有仿照之前曾成功出版的《绣像小说》之意。《绣像小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自 1903-1906 年，共发行 72 期。该刊以小说针破时弊、裨国利民而达服务社会之功效。正如《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写到：“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搏桑崛起，推波助澜。其从事于此者，率皆名公巨卿，魁儒硕彦。查天下之大势，洞人类之颐理，潜推往古，豫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以醒齐民之耳目。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破，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揆其立意，无一非裨国利民。”关于《小说月报》的办刊宗旨，王蕴章指出，“本报以越译名作，缀述旧闻，灌输新理，增进常识为宗旨。”这反映了处于变革时代期刊对中西兼顾的文化追求。同时，王蕴章通过创刊号的《征文通告》这样介绍小说的功能：“现——身，说——法，幻云烟于笔端，涌华严于弹指，小说之功伟矣。”这说明它仍局限在晚清小说界革命的范围之内，把写小说当成说法、宣扬伦理的工具。关于栏目设置，“编辑大意”指出，“其内容则侦探言情，政治历史，科学社会，各种皆备。末更附以译丛、杂纂、笔记、文苑、新智识、传奇、改良新剧诸门类，广说部之范围，助报余之采撷。每限于篇幅，虽不能一一登载，至少必在八种以上。”出版过程中，《小说月报》栏目中绝大部分内容是社会写实、伦理道德、民间传奇类小说。关于作者队伍，王蕴章指出，“本报各种小说，皆敦请名士，分门担任。材料丰富，趣味浓厚。其体裁则长篇短篇，文言白话，著作翻译，无美不收。”由此可见，杂志编辑上，王蕴章追求趣味性和娱乐性。王蕴章的雅俗共赏的期刊定位、中西兼顾的文化追求适应了当时文学市场的需求，《小说月报》创刊的第一年和第二年销量不断上升，以至没有库存而希望从读者手中回购期刊。

王蕴章在《小说月报》创刊号上设置的“改良新剧”栏目为同时期其他文学刊物如《新小说》《小说林》《十日小说》所没有，这一栏目富有新文学意味：采用白话语言、对话表现形式和新式的标点符号，为中国话剧剧本走向成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王蕴章还是中国期刊制定稿约条例的第一人，他在《小说月报》第一期的“征文通告”里说：“本报各门皆可投稿……中选者分五等酬谢，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四元，丙等每千字二元，戊等每千字一元。”这开了我国小说稿酬金的先河，之后，此种做法为其他各刊物纷纷效法，为我国期刊制度迈向现代化轨道起了奠基性作用。

王蕴章于1918年二度编辑《小说月报》，至1920年辞去主编职位，其间编辑了第九、十、十一卷。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标志，开始于1917年的白话文运动，对主要还是以文言文编写的《小说月报》构成了不小的冲击。当时，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期刊发展蒸蒸日上，《新青年》1915年创刊的时候，发行量只有一千册，然而，1917年前后，发行量激增到了一万五千册。与此相对的是，《小说月报》的销量在1918年开始下滑，显现出衰落的痕迹，到1920年“销数步步下降，到第十号时，只印二千册”。此消彼长已然说明《小说月报》的期刊定位与编辑方针与当时的时代潮流、读者市场不再合拍，急需变革。

作为主编的王蕴章为了跟上时代潮流，也在做着努力。《小说月报》从第十一卷开始“改良体例”，增设了“小说新潮”栏目，由沈雁冰负责，“以应文学之潮流，谋说部之改进”，这标志着《小说月报》从第十一卷开始半革新。之后，《小说月报》又设置了以刊载新体白话诗为主的“文学新潮”栏目和以刊登新文学理论批评为主的“编辑杂谈”栏目。在编辑过程中，王蕴章注意与读者沟通，如通过设置“小说俱乐部”、推出续写小说、创办“寒山社诗钟”等形式加强与作者及读者的联系。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商务印书馆的商业改良需要下，1920年11月，王蕴章辞去主编之职，改由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译工作已有4年的沈雁冰为《小说月报》主编。

二、王选：“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复制（排版印刷）技术

王选（1937-2006），是无锡小娄巷王氏惇叙堂（嘉乐堂的前称）的第15代后人，1937年2月5日，王选出生于上海。父亲王素（字守其）年轻时去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毕业后就职于上海，一家人就住在上海衡山路964弄15号。1941-1954年，王选就读于上海著名的“上海南洋模范学校”，从幼稚园直至小学、中学、高中。1954年至1958年，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学习。1958年，王选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无线电系助教，主持电子管计算机逻辑设计和整机调试工作。通过阅读国外文献，他逐步领悟到只有同时掌握硬件设计和程序与应用，才能产生创新。以此理念为指导，王选继续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锻炼英语听力以了解国外的先进技术；1967年承担的DJS21机的ALGOL60编译系统设计工作研制成功，成为国内最早得到真正推广的高级语言编译系统之一；1965-1975年经历了文革的艰难岁月；1975年开始直至2006年2月去世，王选一直奋战在我国汉字信息处理与印刷革命的知识创新前沿，率领团队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使汉字印刷术“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以其跨越式自主创新的系列研究成果，引发了我国报业和出版印刷业的深刻革命。

1975年，王选投入到“748工程”，即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研制工作中；当时国际上照排技术已发展到四代机（“手动式”一代机、“光学机械式”二代机、“阴极管式”三代机、英国正在研制而未实现商品化的“激光拍照”四代机），在对国际照排技术发展动向和市场需求经过详细调研的基础上，在发明了高倍率字形信息压缩技术、攻克了激光扫描控制器技术难关之后，1976年8月，王选决定直接研制还没有商品化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1979年8月，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以通栏大标题报道：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获重大突破，北京大学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主体工程研制成功。这项成果对于我国新闻出版印刷领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1980年9月，王选为首的课题组用激光照排系统成功地排出了一本《伍豪之剑》的样书，这是中国在告别铅字的历程中排出的第一本书。

1981年7月，我国第一台计算机激光汉字照排系统原理性样机华光I型通过国家计算机工业总局和教育部联合举行的部级鉴定。然而王选并未满足，他把追求学术卓越与产业进步结合起来，以发展生产力、造福社会、创造效益为目的，坚定不移地把他的成果产业化。他当时就决定放弃I型机，把主要精力放在II型机上，这是他迈向市场的一大步。1987年，经济日报成为我国第一家试用华光DI型机的报纸。20世纪90年代初，王选带领队伍针对市场需要不断开拓创新，使得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占

领99%的国内报业市场以及80%的海外华文报业市场，不仅从技术水平，而且从商品化程度上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王选被誉为“当代毕昇”、“汉字激光照排之父”，1987年10月，荣获中国首届毕昇奖和森泽信夫印刷奖，2001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三、王益：“一主三多一少”的发行改革

王益（1917-2009），又名鹭如、王希言、王弦，是无锡小娄巷嘉乐堂王氏第14代裔孙，1917年生于无锡小娄巷横街。1934年，17岁的王益被家人送到上海的“生活书店”当练习生，在书店工作期间，王益结识了中共地下党人，19岁时就开始为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印刷出版工作四处奔波，也由此开始了与书为伍的出版社工作生涯。1940年10月起任苏北根据地大众书店经理、华东新华书店经理等。新中国成立后，王益先后担任华东出版委员会副主任，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事业管理局副局长，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益对出版改革、书刊发行、排版印刷技术提高等作出了重要贡献。

坚持问题导向，改革发行体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出版领域实行专业分工，出版社集中精力搞编辑出版，新华书店独家经营图书发行。这种出版管理体制在特定时期有其历史积极作用，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民群众对图书阅读需要的日益提高及多样化，这种发行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出来。以至于出版界出现了“三难”：买书难、卖书难和出书难。图书流通渠道太少、读者买不到需要的书刊，形成“买书难”；由于图书购销形式和所有制形式单一，新华书店害怕订了货卖不掉要承受经济损失，从而形成“卖书难”；出版社不得不自办批发，开办个体、集体书店也受到限制，以上因素导致征订数字越来越少，出版社无法出书，形成“出书难”。至此，实行了30年的征订包销制度，逐渐失去灵验，急需进行改革。

我国出版改革以发行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由王益提出并组织实施。1981年10月，王益主持召开了全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座谈会。“改革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解决，三难，问题，达到货畅其流、书尽其用，使出版工作更好地贯彻“两为”方针，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需要。”会议分析了“三难”问题的产生原因，确定了“一主三多一少”（一主：新华书店是图书发行的主渠道；三多：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一少：少流通环节）的改革方案。该改革方案为我国图书发行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对主渠道新华书店的改革、出版社的自办发行、多种购销形式的出现和民营书业的发展等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被出版界人士认为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吸纳了该方案。1984年，王益又提出，从改变出版与发行绝对分工、出版社也要搞发行入手，推动包销改为寄销，适当提高书价，出版社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化，对图书出版与发行的传统体制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新思路。该思路触及了当时出版发行制度弊端的症结所在，极具现实指导意义。

革新出版理念，严谨求实、不懈奋斗。倡导出版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出版各要素中，王益认为，“人”是占第一位的，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不断提高出版人员的政治水平、业务水平和文化水平。1983年10月，发行体制改革一年多之后，文化部出版局在成都召开了一次发行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会上，王益特别强调出版社一定要重视自办发行，要有长远打算，要看作是一条战略措施，不是权宜之计。他还针对新华书店发行所代表在会上讲到的顾虑（出版社通过特约经销加大发行而影响新华书店的发行），作了耐心的解释：“我要着重谈一下特约经销处……采取这种办法，出版社、书店、读者三满意。因为备货品种多了，到货快了，缺书可以由出版社添配了。”

王益为出版事业不曾间断地操劳70余年。工作中，他恪守严谨求实的高贵品格。其对出版事业贡献方面之多，在我国出版界是罕见的。

结语

王蕴章、王选、王益三代学者、专家，都在其各自的专业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出版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如果说王蕴章以

其文学家的眼光主编《小说月报》，能够关注社会需要，做到因循变革，在中国近代文学出版领域做出了独特贡献的话；那么，王益则是“一生只做出版这一行”，倾其毕生精力为中国出版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而王选则是凭借其独具市场眼光的科技创新成果实现了我国汉字排版印刷事业的辉煌成就，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嗜好读书、情系出版，是无锡王家书香门第的遗风和传统，而无锡小娄巷王氏家族一脉三专家则使中国出版事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对当下我国出版领域探索实现“双效益”具有启发意义。

本文系 2017 年度无锡市社科联招标课题《出版的“两个效益”视阈下无锡王氏家族出版理念研究》（编号：17-C-4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控制技术学院）